



济南文物珍藏

李晓峰 / 著



济南文物珍藏

李晓峰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文物珍藏/李晓峰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488 - 0134 - 4

I . ①济… II . ①李… III . ①文物—简介—济南市
IV . ①K295.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8783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网 址 www. jnpub. 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30 千
定 价 18.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引言

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也可以说,它是历史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当我们在认真地观赏某件文物,仔细地揣摩某件文物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件文物中,可能就蕴含着不同程度的历史信息,浓缩着人类发展的前进历程,反映着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文物既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物质成果、珍贵遗产,也是本地区历史沿革的见证物。

本书中介绍的 45 件文物,是从济南市博物馆众多藏品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其中有国家鉴定的珍贵文物,也有代表各时代艺术发展成果的典型器物。新石器时代的鹿角锄和玉斧,反映了早期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对耕种工具的认识和制作技能,他们利用动物的骨角改造成为农作点种的工具,利用石头的坚韧制作出锋利的砍砸器;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发明了陶器,既解决了炊煮之用,还利用天然的色彩在上面勾画出原始的图画,并利用快轮技术烧造出薄如蛋壳、表面漆黑光亮的高柄杯。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铸造的巅峰期,商代“亚醜”罍形体硕大,花纹细密,铸造精美;春秋齐叔姬铜盘,印证了齐鲁两国之间的婚姻交往。两汉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期,彩绘乐舞杂技陶俑、彩绘负壶陶鸟和彩绘载人载鼎陶鸟,国内独有,皆为国宝。



级文物。唐代的金银平脱宝相花铜镜、三彩釉陶三足炉,宋代的景德镇窑影青瓷壁灯,元代的釉里红折枝花纹玉壶春瓶,更是代表了唐、宋、元时期工艺制作的高超水平;而宋仿郭熙笔意《山水图》轴,则是山东文博单位现知收藏最早的宋代绘画作品。明清之后,工艺美术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新品种、新工艺层出不穷,瓷器、玉器、文房四宝等,无论在制作工艺,还是在追求完美上,都达到了空前繁荣;明清书法、绘画也在历代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繁荣,可谓流派纷呈、千姿百态,成为独树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奇葩。

我们介绍的这些文物,虽然兼顾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涉及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的部分代表之作,但他们仍是祖国万千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点滴,不可能以点盖面。此书的编辑出版,目的在于普及文物知识,介绍济南地区有代表性的馆藏文物,使读者了解文物,熟悉文物,热爱文物,从而使大家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加了解,使大家对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更加了解,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编 委 会

主任：谭延伟

副主任：凌安中 纪宝华 王淑铭

编 委：朱守华 孔 杰 祖爱民 陈东生
刘程华 张 锋 周长风 丁少伦

顾 问：安作璋 李伯齐 任宝祯 李永祥

序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 焉荣竹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济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这里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空起到了重要作用。隋唐北宋时期，济南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高僧义净，诗人崔融、员半千、范讽等皆为一世俊杰，李白、杜甫、高适、苏轼、苏辙、曾巩等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诗圣杜甫留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佳句。南宋以后，济南文坛更是频升巨星，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李开先，皆为一时领袖诗坛的大家，再加上新城（今桓台）王士禛、淄川蒲松龄（清初新城、淄川均为济南府属县），可以说，宋、元、明、清四代，济南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济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长清孝堂山的东汉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

建筑，石祠内的汉代石刻画像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建于隋大业年间的四门塔，是中国最古老的单层亭阁式石塔。位于长清的灵岩寺，唐代曾为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寺内 40 尊泥塑罗汉，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此外，让济南人引以为豪的，还有甲天下的众多涌泉。元代地理学家于钦在《齐乘》中赞曰：“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盖他郡为泉一二数，此独以百计。”众泉喷涌，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景观，成就了济南“泉城”美誉。更兼泉水汇流大明湖，湖在城中，城在景中；南部屏列如黛群山，泉溪淙淙，峰壑森秀。山、泉、湖、河、城有机融合、交相辉映，济南风光秀美如此，也就难怪古人赞叹“济南潇洒似江南”，而“有心常做济南人”了。

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济南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幸运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同样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济南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坚持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出版社等部门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这套“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丛书,对于进一步挖掘济南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济南、建设济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济南、展示济南,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3月



目 录

- 引 言 /1
-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鹿角锄 /1
-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盆 /4
-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 /7
-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穿孔玉斧 /10
- 商兽面纹斝 /13
- 商代“亚醜”青铜罍 /16
- 商代晚期青铜犁铧 /19
- 西周膳夫吉父青铜鬲 /22
- 春秋齐叔姬盘 /25
- 战国齐刀币 /28
- 汉代连弧洁清铭文铜镜 /31
- 西汉“济北守印”封泥 /34
- 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 /37
- 西汉彩绘负壶陶鸟 /41
- 西汉彩绘载人载鼎陶鸟 /44
- 东汉红陶连枝灯 /47
- 东汉红陶猪茅圈 /50
- 唐瑞兽花鸟铜镜 /53
- 唐代金银平脱宝相花铜镜 /56
- 唐三彩釉陶三足炉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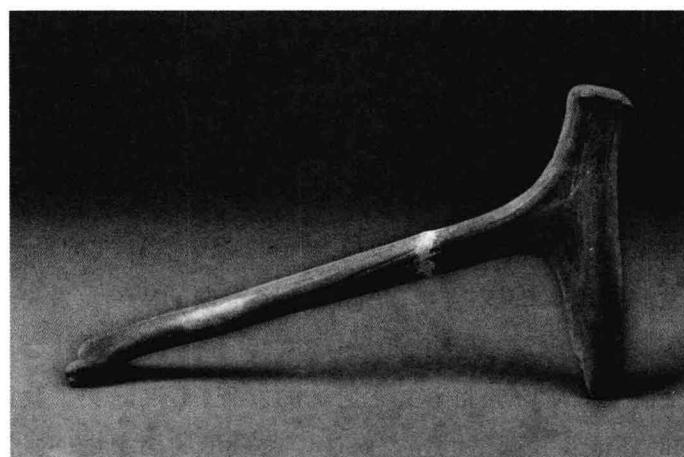


- 唐右领军卫青铜鱼符 /62
宋景德镇窑影青瓷壁灯 /65
北宋仿郭熙笔意《山水图》轴 /68
宋浮雕石质骨灰棺 /71
元釉里红折枝花纹玉壶春瓶 /74
元楠木雕力士像 /77
元末红巾军“管军总管府印” /80
明象牙雕刻寿星 /83
明文氏父子《山静日长图》合卷 /86
明杨慎《烟雨叠嶂图诗》册页 /90
明二龙戏珠玉堂端砚 /94
明张翀《饮中八仙图》屏 /97
明王铎《雪景竹石图》轴 /101
清美丽晶莹的俏色玛瑙 /104
清寿山石雕五子闹佛 /107
清瓷雕窑变达摩立像 /110
清俞龄《竹林七仙图》轴 /113
清高凤翰刻铭天鹅端石砚 /115
清康熙五彩人物纹大瓶 /118
清乾隆于阗采玉图青玉山子 /121
清乾隆兽面纹黄玉扁瓶 /124
清乾隆美女游春雕漆圆盒 /127
清嘉庆刘墉行书轴 /130
清光绪《棉花图集锦墨》 /133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鹿角锄

1959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济南市博物馆联合对泰安市宁阳县汶河沿岸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以高柄杯、白陶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并在若干年后正式命名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山东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在对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采集到一件属大汶口文化的鹿角锄,《大汶口》报告的编写者取其象形,称之为“鹤嘴锄”。此锄长柄,通长52.2厘米,通高27.5厘米,一端为圆平顶,可用于捶击;一端有钝尖,其刃部较为尖利,适于刨掘,应是当时农作点播之工具。此锄现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鹿角锄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除了狩猎作为必要的生活来源外,在长期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既学会了驯养家畜,如狗、猪、鸡等,还学会了种植粮食作物,如水稻、谷子、荞麦等,由此他们从采摘狩猎的游牧式生活方式逐步转变为以种植和饲养为主的聚落式生活方式,其生活质量有了一次质的飞跃。从动物的驯养、繁殖发展为畜牧业,从植物的种植发展为农业。有了这两项生产事业,就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在长年的生产劳动中,人们不仅对各种农作物有了种植的经验,而且对生产方式也有了改变。特别是在青铜器和铁器还没有发明以前,人们就把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石头,根据其形状进行一些必要的加工,打制或磨制成一侧刃部锋利、一侧可以手握或捆绑到树棍上便于使用和操作的石斧、石锛、石铲、石镰等生产工具。对驯养或捕猎的动物,皮用来制衣御寒,肉用来维持生命,而动物的骨骼,特别是动物的角,利用其形状略作加工也成为人们日常的生产工具,从而使先民们提高了生产效率。

人类同鹿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原始先民最初的生活方式就靠狩猎和采集。鹿类性情温和,不会伤害人类,因此成为人类捕猎的重要对象。当然,随着社会经验的积累,人们除了猎食鹿肉外,还发现鹿的其他部分也可利用,鹿角便是其一。用鹿角加工成的鹿角锄,在陕西长安客省庄、黑龙江宁安莺歌岭、山东滕县北辛遗址、泰安大汶口等遗址都有发现。2004年,浙江余姚田螺山发现较河姆渡遗址略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实物较河姆渡更丰富,其中即有大量的鹿角。在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里,北辛文化要早于大汶口文化。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文物普查队在滕县考查,发现了北辛遗址。1978年秋、1979年春对北辛遗址进行了两次历时85天的发掘。发掘面积2583平方米,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发掘中获得的含碳标本经同位素C14测定,其年代距今7300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母系氏族社会趋向繁荣的发展阶段。北辛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我国有发达的原始农业,同时还证实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石制的有斧、铲、刀,以及鹿角制的锄等。鹿角锄主要是利用鹿角的分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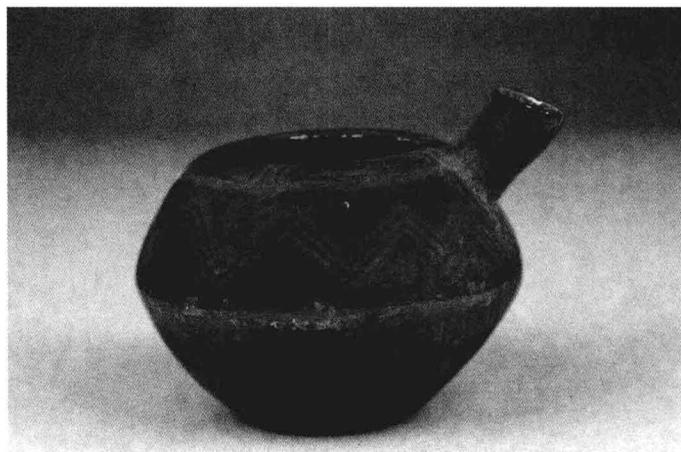
处,把短枝的一侧磨成斜面刃,长枝的一侧为柄部。另外,还有的截取鹿角的一段,将上部进行修整,可安柄。这种鹿角锄,可以在种植时开沟播种或挖坑点种用,也可以作为农耕松土之用。在山东胶州三里河一座墓葬中,还发现另两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鹿角锄,形制和前面的几件十分相似,均是利用鹿角的天然分叉做成。锄的头端均有加工的斜刃,甚至依稀辨得出使用过的痕迹。锄的长度都在 50 厘米上下(北辛文化的那件柄部残断,残长 13.8 厘米),这个长度正好适合人们俯身劳作。

2008 年 9 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济南西南部的崔马庄村西南角一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发掘情况看,这处遗址应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面积约为 360 平方米,是一个不算大的遗址。此遗址出土多件珍贵的西周时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4 件鹿角锄。它们均呈暗红色,大约长 40 到 50 厘米,均有两三个分权,表面比较光滑。这些鹿角锄在山东的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所以非常珍贵。而且 4 件鹿角锄上都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被当时的人长期使用过,这对研究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情况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盆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1959年,由山东省文管会和济南市博物馆联合对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



彩陶盆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发展



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这里当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1974、1977、1978年,我省文物部门又先后在大汶口遗址进行过多次发掘,发现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灰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随葬的轮制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发现了坩子土,用以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器,统称为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少数砂质陶器上饰附加堆纹或篮纹。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在大汶口26号墓中随葬有一件彩陶盃,通高13.4厘米,敛口,圆腹,平底,口径下装一上翘的管状流,腹部外鼓处饰对称板纽两个。口径向里平折,腹缓折,折腹以上绘黑彩,口径部涂黑色宽带,中间空出竖道为段,口沿下黑色宽带间空出复道连三角纹。盃,既是盛水器也是盛酒器,商周时期,盃主要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彩陶盃现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

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雕刻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墓内的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刻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



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财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大汶口遗址被发现后,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曲阜西夏侯遗址又发掘到文化面貌与之大体相同的一处墓地。1964年,将这类遗存定名为大汶口文化。目前发现的遗址已有二百多处,经过发掘的也有五十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省的泰安大汶口、兗州王因、邹县野店、曲阜西夏侯、茌平尚庄、广饶五村、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日照东海峪、蓬莱紫荆山、长岛北庄、栖霞杨家圈;江苏省的邳县刘林和大墩子、新沂花厅;安徽省的亳县富庄、蒙城尉迟寺;河南省的郸城段寨、鹿邑栗台等。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